

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刘绍华——著

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
我的凉山兄弟



一部生命之书

一场横跨10年、长达20个月的田野调查

一本交织着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政治变革的独特民族志

记录凉山诺苏人在现代化浪潮中辉煌又惨烈的青春探险

我希望凉山和我的诺苏兄弟们的生命能广被认识。这是我始终如一的初衷。

——刘绍华

我的凉山兄弟

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

刘绍华——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by Shao-hua Liu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11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sup.org.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 / 刘绍华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117-2690-2

I. ①我… II. ①刘… III. ①彝族—社会调查—凉山彝族自治州 IV. ①K281.7

中国图书分类号 (CIP) (2015) 第 127299 号



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

出版人：刘明清

项目统筹：李伟为

责任编辑：贾宇球

特约编辑：杨晓琼 张祝馨

责任印制：尹 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214 千字

印 张：10.5

版 次：201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55626985



我们有如橄榄，唯有被粉碎时，才释放出我们的精华。

赫拉巴尔
《过于喧嚣的孤独》



地图一：凉山彝族自治州



地图二：凉山州昭觉县

序一 / 黄树民

千山独行

文化行为与疾病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就已受到人类学者的注意。早期研究如北美阿尔衮琴（Algonquin）印第安人的“极地食人妄想症”（Windigo Psychosis），或东非阿赞德人（Azande）传统法医以验尸来鉴定死者是否遭受敌人的巫术伤害等，都是聚焦文化来解释特殊的疾病或生理现象（culture-bound syndromes）。这种研究旨趣直到 70 年代仍受到跨文化心理学者，如香港中文大学迈克尔·邦德（Michael Bond）教授的重视，并从此角度研究东亚文化圈的“缩阳”，或马来人的疯狂（Amok）等心理症状。至今医疗公卫领域亦常借用此类观点。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医学人类学强调文化特征与特殊疾病之间联结的解释架构，已有基本改变。学者扩大其分析视野，不仅重视解释病

因的文化面向，亦强调将疾病放在更大的政治经济框架下，做整体性检视。这种新研究取向，让我们注意到疾病与深层社会结构之间多重纠缠的因果关系，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全球区域发展差异使“南方”成为“北方”新药实验场，社会阶层分化削弱边缘团体的复健能力（resilience），城乡差距缩减农村平均余命，疾病被污名化，文化的力量等。虽说当代医学人类学在欧美早已是炙手可热的学科分支，且不断在理论与研究议题上推陈出新，但在台湾却长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状况，直到刘绍华博士这个研究个案出版，才有根本的改变。近年来已少有学者与学子还愿意探索困难的社会议题，并从事艰苦的田野调查。刘博士凭着过人的勇气、才智与毅力，以海洛因及艾滋为切入点，检讨中国凉山诺苏人何以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沦为双重污名（即落后的奴隶社会及艾滋蔓延）的重灾区。她的分析一方面采取贯时性研究（diachronic approach），追溯诺苏人与解放前汉民族国家之间的区隔与对立，以及鸦片在其中扮演的复杂角色，如何影响当代诺苏人对鸦片类毒品的特殊态度。另一方面，刘博士以现时性研究（synchronic approach）深度参与当地乡民的生活，获得他们的信任，才得以进行高度困难的敏感性研究，深入了解毒品使用者和艾滋患者的内心感受，发掘他们在追求现代性时的渴求、冲动、徬徨与后果。这两种研究方法交织在一起，生动地勾勒出一个完整图像，让我们了解诺苏人所面临的时代动荡与困境。

建基于10年扎实的民族志田野材料上，本书提出几个重要学术观点，对未来中文世界人类学理论讨论或医学人类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第一，作者使用传统人类学的“通过仪式”（rites of passage）成年礼来

解释凉山诺苏青年追求现代性的多重意涵。虽然通过仪式一词近年来为许多社会学、心理学者等借用，解释年轻人在青春期所经历的适应阶段，但本书更将之扩大为一双重隐喻，不仅指涉凉山男性青年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所经历的阶段性成长和付出的代价，同时也意指社会主义中国在1949年后为追求现代性所经历的重大实验性转折和牺牲。这个兼顾宏观现象（社会主义中国）与微观个案（凉山诺苏青年）的研究成果，应会成为人类学经典著作。

本书第二个重要贡献，是对全球化发展趋势及其理论的挑战。在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各地的行为模式、社会制度、伦理规范等都有渐趋一致的倾向，并被视为普世价值。本书却指出这种假设有其根本问题。譬如说由国际组织在当地推动的艾滋防治计划，其中包含反污名的标准作业，但这看似善意的前置作业，在原本对艾滋并不带有歧视眼光的诺苏社会，反而造成新兴的污名化后果。换言之，作者指出全球化的作为，必须考量本地文化特色，适度调整，才有可能避免根本的错误。

这本书是中文世界难得的医学人类学民族志。在本书英文版出版两年内，刘博士又努力将其译写为中文书，并做出许多修改，配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文笔流畅优美，将理论融会贯通于清晰的文字之中，可读性极高。其勤奋治学的态度，足为未来人类学者之楷模。基于上述理由，我全力推荐本书为人类学与民族志研究的基本必读模板。

（作者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序二 / 蓝佩嘉

现代性寓言 土匪兄弟的

四川西南凉山州的利姆乡，是个从州府西昌还要坐上十小时颠簸巴士才能到达的偏远山寨。这里是少数民族诺苏族的故乡，也是人类学者刘绍华的田野地。她想要探讨一个基本而重要的疑问：为什么这个贫困偏乡会成为海洛因和艾滋病双重袭击的“重灾区”？

绍华于是捆起包袱，进驻当地进行为期一年的参与观察。身为一个汉人女性，她无法被归入在地人群的分类；靠着偶然见了鬼，她因而得到当地人的接纳；外来者的身份却让她得以跨越性别界线，结交外人眼中的“土匪”或当地人称的“兄弟”。

绍华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回到“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工作后，陆续重访凉山，见证了疫情的肆虐以及地方的衰败，也被当地不稳定的电压烧坏了几台计算机。这本书先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英文版，

而今增补改为你手上的这本中文书。当朋友们赞叹她的勤奋与效率时，绍华如是回答：我得赶快写，赶紧替他们“翻案”，否则赶不上田野里死亡数字的攀升。

凉山兄弟的故事，是一个现代性的悲剧寓言。对于中国的少数民族来说，现代化历程有着双重阶段。首先，1956年起，中国政府在凉山强力开展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计划，诺苏族人被烙上“野蛮民族”与“落后乡巴佬”的双重污名。中国政府通过集体公社的制度、“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摧毁了当地的社群关系（贬为“奴隶制”）与文化仪式（抑为“迷信”）。

其次，1978年改革开放后，凉山被市场的力量再度整合进资本主义现代性。城乡与区域间的发展不均，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急速扩大，利姆地区的低度发展与边缘化，加上市场文化的全面蔓延，促使诺苏青年跃入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行列。离乡进城探险，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到城里耍一耍”，成为利姆年轻男性的“成年礼仪式”，以在摩登城市中冒险犯难来成就男子气概。然而，不谙汉语、不擅经济理性的诺苏人，在竞争激烈的都市经济里难以成功发迹，许多只能以偷抢扒窃来谋生。在城市耍玩的历程中，海洛因被利姆年轻人视为一种时髦奢侈品，是时尚与地位的表征，而非主流社会所界定的“毒品”。成瘾的流动青年传回凉山的，不仅是海洛因，还有日益扩散的艾滋疫情与社会苦难。

本书也从医疗人类学的角度，深入分析艾滋污名的社会建构以及艾滋防治的政治经济学。外来的卫生人员与干部往往不能理解，何以当地人对于艾滋感染者并无歧视，绍华则贴近诺苏文化的道德世界，帮助我

们体察当地人有关疾病与死亡的分类。吊诡的是，国家与国际卫生组织所推动的反艾滋污名行动，反而引入了艾滋的污名。本书检视国际艾滋防治合作计划的失败，批判官僚体系与外来专家看轻与漠视地方文化，未能与当地社会关系结盟合作，以致无法有效控制艾滋的新兴危机。这方面的分析对于公共卫生政策与医疗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反省。

在学术的分析语言之上，本书伸出温柔的手抚慰苦难与死亡。透过“伤心人类学”的书写，让我们从同情性的理解中，营建包容差异与见证苦难的疗愈力量。绍华这样描述她的受病痛与死亡所苦的兄弟们：

有人无法脱离海洛因，似乎未能从这场通过仪式中走出来。

在此中间阶段停留太久的结果，让他们一直处于混沌状态。未能返乡重拾原有的生活，也未能在城市寻得合法的生计，对海洛因的依赖让他们身心俱疲，生病与死亡更成为常态。（页 108）

当代欧美人类学已被后现代的抽象论述与反思叙事所占领滩头，绍华不逐流行，坚守民族志的传统，以白话、生动、准确、流畅的文字，剖析社会变迁的物质过程，洞察社会灾难的结构根源，见证了现代与传统、全球与区域、生命与死亡的交织辩证。本书不仅应该成为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者的必读教材，在现代性洪流中载浮载沉的我们所有人，也都可以从中得到重要的启发。

（作者系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跨国灰姑娘》作者）

序三／麻国庆

他者的苦恼：

凉山兄弟的毒品与艾滋

我最初知道“西南民族”“凉山”等概念，还是在近三十年前，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读硕士生阶段。当时在课堂上，不同的老师都会提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的创始人杨成志先生，如何独自一人进入当时称为“僛僛”的现在的彝族地区，进行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民族志调查，由此开创了人类学、民族学西南民族研究的先河。2004年秋，我调职到中山大学，有更多机会接收珠江三角洲外来打工人口的信息，尤其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包括来自西南的苗族和彝族等。这些从西南山地来到发达地区的民族，他们如何适应、融入当地的社会和文化呢？他们会产生哪些社会问题呢？出来的人大多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的流动又会有何问题产生呢？

在我的印象中，庄孔韶教授是较早关注流动出来的彝族社会问题的

学者之一。他主要从出来的彝族年轻人如何染上毒品、如何戒毒来进行讨论。在影视人类学纪录片《虎日》中，对彝族的戒毒过程，他强调当地的社会文化传统如家支等亲属组织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对于来自官方的所谓“科学”的戒毒模式则提出了质疑。看完影片，我想，这些彝族青年回到家乡后，他们的生活和疾病状况如何呢？他们所处的社会如何卷入到全球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直到2014年，我有机缘与刘绍华博士长时间交流后，才进一步了解到，她对彝族社会围绕着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进行了长时间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写作了《我的凉山兄弟》一书。这本著作的英文版2011年已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是在英文版基础改写而成的。这是我看到的近年来西南民族疾病与社会文化方面难得的优秀民族志作品。杨成志先生如果在世，一定会对他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调查的“傜”社会出现如此严重、可怕的毒品和艾滋深感不安，而对于年轻的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深入调查和分析，也一定会从人类学家的角度进行赞扬。

喜闻绍华博士的简体字版将在大陆出版，委以作序。遂重阅绍华的书，并读相关研究，对杨成志先生的早期研究亦重阅之，以寻静与动之感，如此更觉绍华的研究在社会转型中的学术价值。

我个人接触到疾病与社会文化的研究，还是十多年前在大小兴安岭做的鄂伦春族调查和研究。作为一个传统的狩猎民族，当鄂伦春族面临着来自国家的“禁猎转产”“定居化”“新社区”建设等政策时，他们所表现出的焦虑和困惑至今仍浮现在我脑中。三年多前，当我再返回原来的调查地时，他们的变化更让我吃惊，很多鄂伦春猎民已经住进了楼房，远离他们的生计空间，我问：“你们真喜欢这种生活吗？”他们说：“不

知道，反正楼房住得方便。”那生计怎么办呢？他们不知如何作答！我去的另外一个猎民点，十多年前有七名孤儿，当时他们还在上小学，但干部告诉我，因养父母离开人世，这七个孤儿生活没有规律，经常喝酒，都已过世。我非常震惊。讲的人很轻松，可能已经习惯了。

在我调查的鄂伦春社会，疾病、自杀、异常死亡率非常高。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调查中，就提到该区域的鄂伦春人完全没有卫生观念，从生到死都没有进过浴盆，其他的不洁几乎可以想象。一旦有病，他们并不依赖于医药，而是靠萨满的祈祷。因此，死亡率非常高，人口逐年减少。天花、呼吸系统疾患、疟疾、与月经有关的疾病、遗传性梅毒、眼病等，都和居住有着相当的关系。然而，即使在这样的鄂伦春社会，（都市）文化也开始进入伴随着文明病的病原菌的处女地带。在30年代，这一区域的鄂伦春族已经染上鸦片，引发了很多卫生和健康的問題。这些问题都是由外来的植入在原住民族的所在地发生的。

而在现代社会，随着全球卫生体系和健康观念不断深入人心，上述这种极端的案例已经销声匿迹。然而，由于全球化运动，人口流动性越来越高，各种疾病的流行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比如毒品与艾滋。在西南彝族社会特别是大小凉山的彝族社会，人们所染此毒和此病，都是在离开本土、出去“闯世界”的过程中掉入泥潭和罪恶的深渊所致。由个体而及群体，逐渐成为当地的“社会病”。

绍华博士在讨论彝族社会毒品和艾滋的问题时，不是简单地以一种传统说教式的框架，比如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地方化、民族与国家等二元模式来展开填空式的叙述，而是以自己作为观察者、研究者，与他们长时间地交流、对话、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融入当地

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活动中，同时又与这个社会保持了一种人类学上说的研究距离（detachment），与所研究的社会保持了进与出的密切关系。她在田野中把握到了彝族社会的脉络，将这一社会由毒品和艾滋所引发的个体、家庭、群体、社会，及其所面临的焦灼、不安、困惑、苦恼，以及渴望与生存等种种身体与社会的病例，聚焦在现代性、全球性、政治经济体系、国家主导等分析视角下，进而展开对研究对象的讨论和思考。

对于个体的研究，传统的人类学一直是把个体纳入群体或社会中予以思考，强调对于集团的研究，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个人的研究。即使有很多个人史的材料，往往也还是将其归类在某一个框架之中。而在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中，则把个人作为研究的中心，如身体、感情、苦恼等。我们不能体验他者的苦恼，但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的苦恼。绍华博士提到诺苏年轻人在追求现代性时表现出两个层次的个人主义，第一个层次类似于我们一般了解的西方个人主义，第二个层次称之为晚近现代性情景中的个体化或制度化的个人主义，这里她更强调后者。她讲述了八个人的生命史和四兄弟的故事，在个人和家庭之间的关系中来检验个体性的特征。用她的话说，他们的生活经验和个人叙事“简直就是利姆毒品问题的缩影”。

彝族社会的年轻人，尤其是流动的年轻人表现出来的个体化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显示出了一体两面的特点。一方面，追求个人的特殊性，想挣脱彝族社会集团化（如家支组织）对他们的约束。另一方面，当他们漂泊在陌生的城市之间，而城市却把他们抛弃时，他们又不得不回到这个组织化的社会中。特别是从监狱或劳改出来的人们，对于家乡的依

赖非常显著。如作者在书中曾感慨地表述过，大多数年轻人在他们家乡都进过监狱，甚至会进监狱和出监狱作为一个时间的参照系，像“这辆拉客人的面包车，是他出监狱的那一年这个主人买的”。所以，在这些涉毒和艾滋病人回到家乡的初期，以家支为基础的亲属关系网络在戒毒和疾病的治疗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而在国家层面，卫生保健是集体生活的一部分，官员习惯于以科学知识取代诺苏传统的医疗认知。比如，当谈到中英计划的失败时，作者将其归结为两大因素，即官僚体系的缺陷与国家代理人文化职能的欠缺，国家代理人并没意识到自身的文化偏见对于政府治理所带来的伤害。作者的报导人之一、当地卫生院院长抱怨道：“防疫站左手接到工作，右手就递给我们，他们的工作就像邮递员似的。”所以作者认为，利姆禁毒运动失败，部分要归咎于权威者无法感同身受地理解年轻人流动与吸毒的行为。接下来，作者从污名角度来讨论艾滋污名与歧视在中国如何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把艾滋症状与当地人对于疾病的认知体系联系在一起，用当地人的话来说：“艾滋病死的就跟生病死的一样，没什么两样！”这也就是为何利姆的诺苏人并不歧视艾滋感染者，至少开始时如此。近年来，又悄悄发生了一些变化。作者访问过的多数年轻人都明显表现出排斥与感染者结婚的想法。

在对毒品与艾滋讨论的基础上，绍华博士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讨论疾病治理的时空意义，并把疾病治理置于国家政策以及全球现代性的发展轨迹中进行思考。因此，正如作者所思考的那样，把诺苏与中国的特色放入全球化历程之中，才能顾往并前瞻。而像利姆所代表的中国其他地区边缘群体，如面临到类似的问题时，是不是同样也会遇到现